

「人民的鴉片」仍極具誘惑

貝納德著 馬永康譯

浦東，這顆位於上海市黃浦江的新明珠是如此的璀璨瑰麗。這裡數年前仍是一片種植稻米及其他穀物的農地，今天卻搖身一變成爲中國經濟命脈重要的一環；很多跨國企業都在這裡開設公司。在這個儼如中國的「紐約大都會」裡，聳立著那巨大的（高四百六十八米）、三腳架般的電視塔，看起來就像一個火盆，或是盛載著酒用以祭祀一衆商神的器皿。而在百米以外就是那樓高八十八層、輕巧修長像一所佛塔的辦公室及酒店大樓——金貿大廈。這一切是在這個標誌著現代中國新典範的新城

市裡，僅有的一絲和宗教有關的痕跡。這裡甚至容不下一所教堂或祀廟。在中國的其他城市裡，信衆最少可以找到一個地方燃點香燭供奉一尊小神像或在一所茅草蓋的簡陋小屋裡舉行感恩祭，然而，在這裡的現代金屬建築物之間，卻沒有那些已被遺忘的神祇的容身之所，人們信奉的就只有那一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神」。新上海，就像新中國一樣善於適應時代的轉變；不旋踵，她已從一個忠實的馬克思唯物辯證法擁護者轉投到商業及消費物質主義的懷抱。

按理說，這裡該沒有神祇立足之地，但基督新教派的統計卻顯示，在中國的沿海城市如上海等最發達的區域，基督徒的人數每年均有一成至一成的增長。在這些新教眾中有著不少的專業人士及商業機構的管理人員，他們在追逐名利之餘亦不禁要問，究竟人生除此以外還有甚麼其他意義？由此可見，即使在今日的新中國，宗教信仰仍然佔有重要的一席位。

回顧中國在過去五十多年的共產政權統治下，政治上的最大污點不是那導致三千萬人死於飢荒的「大躍進」運動，也不是那黑白顛倒、社會大混亂的「文化大革命」時期，而是宗教政策的徹底失敗。儘管在過去的五十二年裡，共產黨把各宗教視爲洪水猛獸，必須除之而後快，然而，宗教信仰的人數卻是與日俱增。若把具信仰的人都算一下，不管他們信奉的是那些組織完善、具規模的宗教，抑或是結構鬆散、甚至完全没有團體組織的教派如佛教或道教（它們的信眾可能只是每年到廟宇或道

觀參拜一至兩次而已），則中國大陸一半以上的人口均是有某種信仰的。若再加上那些在黨內、軍中以及各政府機關裡，有信仰卻又不敢承認的人，人數便更多了。

這個現象實在是無比尋常的，試想一下，在中國社會，除了世俗事務外，人民接觸得最多的就是政府的宣傳系統日夜不停地灌輸的各種意識形態及教條，這其中有無神論的、社會邊緣化（social marginalization）的、反宗教運動的，甚至是有關各種被迫害、施以酷刑甚或處決的消息。然而，在過了五十多年這種日子以後，竟然尚有部份宗教能保存下來，這不得不歸功於傳統中國家庭的團結力量，尤其是尊敬長輩及敬畏鬼神（*undorn*）的思想，這實在是擊中了那些激進唯物論分子的要害，教他們氣焰盡消。

宗教之所以能再度抬頭，其實亦和共產主義沒落所帶來的貪污、暴行及盲目追求特權有關。當人民對馬克思主義的幻想破滅，同時亦察覺到物質

主義最終所帶來的只有空虛時，他們便知到，他們其實最需要的是心靈的撫慰。一個很好的例子是，那些對現今中國領導層徹底失望的前紅衛兵，他們往往因為懷著一份對過去所作所為的罪惡感，而希望能藉傳統宗教或基督的精神找到道教追尋的「內心的平靜與祥和」。尤以基督教派所倡導的悔改及寬恕的精神及其認為痛苦背後是有積極意義的主張，成爲誠心悔改的人的苦海明燈，爲他們提供了一個較佛教的輪迴學說及道教的樂觀相對主義更優勝的解脫辦法。讓我們以一位姓黃的老共產黨員的經歷爲例，這位黃先生一九三二年出生於河南縣，一九八八年死於癌症。作爲一個三十年的老共產黨人，他見證了馬克思主義在中國的興衰。終其一生，黃先生都致力「爲人民服務」，他曾寄望連番的改革能幫助遏止泛濫於黨內的貪污浪潮，但最後當他在醫院彌留之際，有一班天主教徒來慰問他，他對他們說：「雖對共產黨來說，宗教是可怕的人民鴉片，但我實在需要這鴉片。」自由市場經濟之風

亦爲宗教帶來生機：不論是開辦何種業務或合資企業，人們少不免都要到各大小廟宇祈福，希望能鴻圖大展、一本萬利；君不見北京的道教白雲觀，每天都有大批的善信到來祈福，他們當中有年輕的、有私人企業老闆、更有母親及其子女，而他們的願望五花八門，由想考試旗開得勝到身體康健、發大財的都有。

市場經濟本身所衍生出來的問題（即下崗、痛苦焦慮及遷徙）也使人再期望可從信仰中獲得慰藉：佛教及基督教派團體開辦了很多慈善事業去照顧那貧苦的、殘障的和年老無依的，雖然未必可藉此使人加入主辦團體所屬的宗教，但最少亦贏得了社會的敬重。其實，馬克思主義和資本主義的理論都是以社會結構爲基礎，而並非以個人爲本。在尋找個人價值基礎的過程中，學者及研究人員發現，除了意識形態及經濟因素外，他們的研究亦必須觸及哲學及東、西方於這方面的差異的領域。

研究進一步發現，法國大革命所蘊含的啓發

及智慧，其實也包括宗教的層面。亦是由於這個原因，部份大學生放棄修讀那些能使他們成爲專業人士的學科，而選擇了宗教方面的研究。也可能是這個原因驅使很多年輕的非教徒，於聖誕及復活節期間湧到中國各地的聖堂去。他們大多因爲好奇而來，並於感恩祭結束後問道：「究竟基督及佛祖的降生，在意義上有甚麼不同？」很多人爲了尋找答案而參加慕道課程。這個現象持續了多年，並有越演越烈之勢，情況之嚴重迫使江澤民主席在多年前便警告要防止西方精神污染入侵，並下令愛國會派發入場券予已登記之教徒，唯有持券的人士方可進入聖堂。這股湧往宗教懷抱的人潮活像洪水般的勢不可擋，也就在中國領導層內敲響了警鐘。爲使黨能緊貼著社會的脈搏，江澤民不僅邀請資本家入黨，甚至連有信仰的人士亦在被邀之列。江澤民在二零零一年舉行的宗教工作會議上承認：「宗教將與社會主義共存一段頗長的時間，我們黨的無神論領導人說的『宗教必須爲社會主義服務』，意思不

是要信仰者捨棄其信仰。」與此同時，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潘岳懇請黨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教條，不要再拿宗教當成人民的鴉片來辦。這類意見自然的在黨內引起混亂及遭到反對，事實上，在發表言論後的數天，潘岳便受到黨內批評；而江澤民整篇的談話亦罕有地被轉載出來。一方面，承認曾看過聖經及可蘭經的江澤民強調宗教對於藝術、文化、道德與及大公主義的重要性；而另一方面，政府卻繼續逮捕及迫害福傳團體、法輪功、回教、西藏教及天主教地下教會的信徒，以他們拒絕接受黨的控制入罪，因爲他們都蔑視了黨，這個中國唯一的真神。

中國共產黨因爲未能捍衛宗教自由而有被世人嘲笑之嫌，試看看，他們繼續以「正統宗教者」自居，對宗教事務恣意批評、越俎代庖，在可蘭經的教義上擅立誠條，強行改變選拔西藏教喇嘛的儀式，凡此等等，竟是出自一個號稱「無神論」政權的手筆，世事之荒唐，莫過於此。 □